

习近平关于亲清政商关系重要论述的理论要旨与实践进路

■ 吴茂朝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用“亲”和“清”两个字精辟概括并系统阐述新型政商关系。推动形成亲清政商关系，“亲”是要求，“清”是底线。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亲清政商关系的重要论述，对推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是正确处理政商关系的基本遵循。

一、习近平关于亲清政商关系重要论述的理论要旨

（一）亲清政商关系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亲清政商关系，是新时代政商交往的行为规范。亲清政商关系在宏观层面上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在中观层面上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在微观层面上是党员干部和企业家的关系，可以从“亲商”“亲政”“清政”“清商”四个维度来阐释。

“亲商”就是要求党员干部等公职人员与企业家坦荡真诚交往，积极主动为企业服务，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政府应为企业发展提供必要支持和保障。政府通过简化行政审批、优化服务流程、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等措施，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同时，主动倾听企业声音，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亲政”强调企业家积极主动与政府沟通合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企业家要增强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支持政府各项政策措施的实施，守法经营、诚信经营，树立良好形象，共同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企业向地方政府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建议，积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

“清政”要求公职人员与企业家交往时清清白白，保持公正廉洁的政风。党员干部要坚守法律法规底线，坚决抵制权力寻租和利益输送的诱惑，改进工作作风，树立务实清廉的形象，以公正高效的服务赢得企业和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清商”强调企业要在经营活动中洁身自好、遵纪守法、诚信经营。企业要健全内部控制机制，防范商业贿赂、偷税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注重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员工的劳动保障义务，对消费者的质量安全保障义务，对社会的环保等公益责任。

（二）亲清政商关系的特征

亲清政商关系的本质在于权力和资本之间的和谐共生与互相制约，强调政治权力与市场资本在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的基础上实现共赢。在亲清政商关系下，政府以公正廉洁的态度为企业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而企业则通过诚信经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来回报社会。这种共生关系的根本在于政府与企业之间通过平等、透明的互动，共同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其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

法治化。法治是亲清政商关系稳固发展的基石，通过法律法规约束构建规范有序的政商交往环境。政府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确保企业合规经营；企业则要依法经营，参与市场竞争，杜绝利益输送。同时，法治化也强化了对政商关系的监督与制约，确保政商交往在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下进行。

平等性。亲清政商关系体现了政府与企业平等基础上的合作关系。政府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与企业平等对话，共同制定政策，解决制约发展难题；企业可以主动参与治理，在意见反馈、政策制定中发挥作用。平等性有助于推动政商关系向更加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

人民性。亲清政商关系的最终价值目标是实现人民利益的最大化。政府要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支持企业发展等方式，促进就业创业、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民生福祉；企业则通过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创新、履行社会责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的良性循环。

二、习近平关于亲清政商关系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党的建设观点的辩证运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具有推动生产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资本在运行中可能带来资本集中，导致社会发展不公平和资本矛盾的加剧。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待资本的作用，既要承认其推动生产力的正面作用，也要警惕其剥削性和负面影响。资本是一个中性概念，资本作用发挥的好坏在于产权制度、分配制度等系列制度的安排和资源配置的方式，通过法律、社会保障、市场规范制度、政府调控等手段，可以限制资本的负面影响。因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团结凝聚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各方面积极力量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也要通过合理的方式限制资本消极影响。把握资本特性，正确引导，以“亲清”关系概括政商关系，是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的生动实践。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指出，无产阶级政权是服务人民的，必须强化对公职人员的监督，防止公职人员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列宁强调通过监督保证党员干部以优良的品质和良好的精神状态为党服务。这些观点强调党的干部履行推动经济建设的职责使命，也明确接受监督的无产阶级政党本质要求。

（二）历史逻辑：中华历史文化中政商关系的历史镜鉴

中国历史文化中，良好政商关系是促进商

业发展和政治稳定的重要保障。历史上关于政商关系的事例很多。春秋战国时期，范蠡与吕不韦通过资助助国展现早期政商互动；宋元商业繁荣催生名商巨贾，明清形成地域性商帮网络。然而，传统政商关系本质呈现“权力依附性”特征：商人通过经济资助或行贿获取政治庇护，政治权力则通过干预商业活动实现资源再分配。这种“亲而不清”的共生模式在近代达到极致——“洋务运动”中官办资本与政治权力深度捆绑，国民党统治时期与官僚买办资本与军阀统治交织，阻碍社会革命进步。总体上，历史上的政商关系“亲”而不“清”，政商关系更多是政治权力与商人利益交织，经济利益与权力寻租、封建腐败相互捆绑交织。发展新型政商关系，要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去掉封建社会政商关系的糟粕内容，发展其中的积极成分，促进新型政商关系发展。

（三）实践逻辑：改革开放以来政商关系的实践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商关系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深刻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明确“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政府既是重要的市场主体，更是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管理的主体。政商联系、政商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紧密、复杂、多样。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把握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规律，正确认识政商关系的时代特点，既团结调动各类市场主体发挥作用，又通过建立法律法规制度、反腐败倡廉建设规范政商行为，打击商人的破坏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严惩惩治党员干部的不廉洁、不作为的行为，促进政商关系和谐有序发展，为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提供了历史借鉴。

（四）国际逻辑：国际经济贸易竞争对营商环境的现实要求

市场经济本身是开放经济，经济的不断发展要求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优化生产要素、拓展市场，这就是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资本世界范围配置，要求有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环境。资本对市场环境高度敏感，市场环境好、营商环境优，才能有效吸引资本，扩大生产和贸易；反之，资本逃离、生产萎缩，贸易受阻，经济形势也会向坏。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是市场发展、贸易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必然内在要求，是统筹开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必然要求。

三、习近平关于亲清政商关系重要论述的实践进路

习近平关于亲清政商关系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意蕴深远，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深刻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学理逻辑

■ 乔宇玮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自我革命”这一重大命题，丰富了全面从严治党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自我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形成紧迫性，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厘清这一重要思想的学理逻辑对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具有重要意义。

一、逻辑起点：以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来源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

第一，无产阶级政党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革命性彻底性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属性，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而将统治权牢牢掌握在本阶级手中。与其他政党不同，无产阶级政党的最终目标就是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而这一目标也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观念的革命性变革。列宁则提出了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力源于不断的自我反省和修正，唯有永葆斗争精神与批判精神，才能真正履行好为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使命。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克己慎独、革故鼎新思想，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民族基因与传承之源。古代圣贤指出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以及“吾日三省吾身”等重要观念，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修身自省的重视，强调个人必须通过长期自我改进，才能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革故鼎新”强调去旧立新、破除旧事物，发展新制度，体现了古人常中求变的思想自觉，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通过刀刀向内实现国家治理的革故鼎新。

二、逻辑展开：以外部挑战、内在动力、价值目标为考量对象

第一，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是自我革命的外部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不通过自我革命解决这些危险与考验，就无法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在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的背景下，党的执政条件和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党能否继续保持在国家与社会中的主体安全。因此，党自身需要保持战略定力，不断开展自我革命，以理论和实践的自我提高来化解外部环境的考验。

第二，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是自我革命的内在动力。自我净化主要包括思想、组织和作风方面的净化。思想净化就是从思想方面进行自我改造，筑牢理想信念的根基。组织净化就是要强化党的组织观念，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严密有力的组织体系。作风净化就是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政绩观，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自我完善就是要健全自我革命的制度、体制、机制。既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又要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自我革新就是自觉地进行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实际问题，在人民群众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理论，从而更好指导工作，也要强化问题意识、时代意识、战略意识，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联系，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新的重大课题。自我提高则是提高自身学习能力与实践能力，以人民为中心，增强党性修养。

第三，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自我革命的价值目标。党的坚强领导是国家发展稳定的根本保证，而党与人民的紧密联系则是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基础。当前，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强烈，这些都迫切要求我们以自我革新的政治勇气推进党的建设这一系统工程，持续提升管党治党水平，使党始终成为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始终保持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定力，永葆党的先进本色，深入贯彻新时代党建工作的总体部署，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才能进一步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的政治根基，才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永葆党的生机活力。

三、逻辑归宿：以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为理论目标

第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将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推向新的高度，这一思想深刻回答了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防止政党僵化、脱离群众等实际问题，为无产阶级政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党通过自我革命有效应对权力腐败、利益诱惑等各种考验，这一实践探索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当代内涵。

第二，提供新时代继续推进两个伟大革命精神动力。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为全党提供了自我革命实践的思想指引，不断激发全党攻坚克难的勇气和智慧，确保党在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而这种刀刀向内、刮骨疗毒的勇气，正是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根本保证。

基金项目：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24 年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学理逻辑与江苏实践研究——基于江苏省纪委监委通报案例”（项目编号：xcxjh202417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消费主义思潮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消极影响及其对策研究

■ 覃 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作为现代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精神现象，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特征。其中，消费主义是对大学生影响最为显著的社会思潮之一，其在高校中广泛传播，与享乐主义与个性生活方式密切结合，在放大学生消费欲望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

一、消费主义思潮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消极影响

消费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不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价值观。第一，消费主义思潮可能导致大学生理想信念弱化。它作为一种植根于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思想，通过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和为行，持续刺激感官欲望，逐渐侵蚀消费理性。这种思潮让学生在追求消费享乐和物质满足的过程中忽略对理想信仰的关注，可能导致大学生丧失批判性思维和社会责任感。第二，消费主义思潮可能扭曲大学生审美观念。消费主义在网络背景下，唯物主义价值观对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使大学生陷入过度追求物质的拜物教行为中，让大学生过度依赖商品和品牌，导致审美同质化。第三，消费主义思潮可能使大学生掉入欲望陷阱，它让大学生过分追求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导致大学生缺乏对真正价值的思考 and 认识。

二、消费主义思潮对大学生价值观消极影响产生原因

消费主义思潮对大学生产生消极影响的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大学生正处于人生发展

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等共性问题开展专项攻坚。三是创新方向聚焦智慧化沟通机制。构建“线上+线下”立体沟通网络，线上开发政企直通 APP，实现政策智能匹配。运用区块链技术打造政商交往存证系统，实现沟通记录全程可追溯。建立重大政策企业家参与机制，提升政商互动的科学性与透明度。

（三）构建法治化治理体系，筑牢政商良性互动的制度保障

市场经济本质是规则导向型经济，法治化制度设计是规范政商关系的根本保障。一是完善市场法律法规。秉持“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推进《市场主体权益保护法》《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等专项立法，重点规制政商交往中的权力越界与市场垄断行为。建立立案前预审估机制，针对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新兴领域预设法律规制条款。强化司法裁判指引功能，通过发布政商纠纷典型案例确立司法裁判标准。二是强化干部法治能力建设。切实加强党员干部等公职人员的纪法规学习教育，通过专题培训和案例教学，推动领导干部形成法治思维，严格遵循“法定职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将法治要求内化为行为准则，增强规矩意识与底线思维。三是建立政商交往权责界定机制。实施政商交往“三张清单”制度：制定政商交往正面引导清单，明确服务企业事项清单与审批流程；建立负面禁止清单，严格界定利益输送、权力寻租等禁止性行为；配套责任追究清单，细化违规行为的责任标准与程序。强化全链条制度闭环，健全政商交往的良性制度屏障。

（四）深化全面从严治党，营造政商协同发展的政治生态

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是构建良好政治生态的根本保障，为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涵养优质政商环境。一是持续优化党内政治生活。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持续推进正风肃纪，严肃政治纪律和规矩，以党内政治生活为抓手，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根治政商关系中的“不作为”和“乱作为”现象，确保党员干部行为符合纪规规矩要求。二是完善党内监督体系。将亲清政商关系作为常规巡视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监督执纪的威慑效应。构建多元化、全方位、常态化的监督体系，发挥司法、人大、纪检监察等机构的监督职能，拓宽社会组织、行业协会、新闻媒体等主体的监督渠道。利用“互联网+”技术简化政商交往流程，压缩寻租空间。三是加大问责力度。对违法违规、滥权妄为、损害企业及个人利益的行为坚决问责，对查出的问题纠正并追究到人，防止破坏营商环境、损害企业利益现象的发生。同时，公开问责结果，增强问责制度的透明度。对违反市场规范的经营主体依法严惩，维护市场秩序，营造守法经营的社会从业氛围。

（作者单位：中共黄石市委党校）

方。”首先，思政课应将消费道德教育纳入教学内容，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例如，可以通过案例分析、情景模拟等教学方法，让学生了解过度消费的危害以及理性消费的重要性。其次，思政课应注重培养学生的风险意识，帮助他们识别和应对消费陷阱。例如，可以通过讲解网络诈骗、虚假广告等案例，增强学生的防范意识。最后，思政课应引导学生将个人价值追求与消费行为相结合，培养他们的科学消费观念。例如，可以通过讨论消费与幸福的关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取向。

大众媒体是消费主义思潮传播的重要渠道，因此加强对其监管至关重要。首先，政府应建立严格的广告审查机制，杜绝虚假宣传和夸大事实的行为。例如，可以设立专门的广告审查机构，对广告内容进行严格把关。其次，媒体应加强自律，确保传播内容的真实性性和客观性。例如，可以成立媒体自律委员会，对媒体报道进行监督和评估。最后，社会公众应积极参与媒体监督，通过举报和舆论监督等方式，促使媒体更加负责任地履行社会职能。例如，可以建立公开透明的投诉渠道，方便公众对不良媒体行为进行举报。

四、结语

消费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消极作用不容忽视。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发挥高校思政课的强大育人功能以及加强大众媒体监管，可以有效减少消费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消费观念。这不仅有利于大学生的个人成长，也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再阐释

■ 李 赢

度参与。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人工智能的价值创造过程实质是人类劳动的物化呈现。

二、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性与发展

在人工智能时代，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视角审视，劳动量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占比下降，而劳动质的地位与重要性愈发凸显。这种劳动量与质在价值创造中比重变化的趋势，将形成一种反向推动力，促使人类劳动不断朝着创新创造的方向迈进。首先，劳动范畴的拓展与深化。在人工智能时代，虽然智能工具在劳动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们本质上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人类为了提高劳动效率、拓展劳动能力而创造的工具。劳动的范畴从直接的体力与脑力劳动，拓展到包括对智能技术的研发、管理和监督等间接劳动形式。这些间接劳动同样是价值创造的重要源泉，它们通过智能工具的运行最终转化为商品的价值。其次，价值创造的新机制。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创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生产劳动，还涵盖了数据生产、算法研发、知识创新等新型劳动形式。数据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中发挥关键作用，企业通过收集、分析和利用用户数据，优化产品设计、精准营销，从而创造更多价值。同时，算法研发和知识创新为智能技术的发展提供支撑，它们与传统劳动相互融合，共同构成价值创造的新机制。最后，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劳资关系的新变化，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一方面，企业利用智能技术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关注劳动者权益的保护，避免因技术进步导致大量劳动者失业和贫富差距扩大。另一方面，劳动者不断提升自身的技能和素质，适应智能时代的劳动需求，增强在劳资关系中的谈判能力。政府也通

过制定相关政策，引导企业合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促进劳资关系的和谐稳定。

三、人工智能时代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再阐释

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我们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进行再阐释，坚持和发展这一理论。首先，人工智能驱动下的无人化生产模式，使得现代工人逐渐从生产场景中淡出，对商品生产与劳动之间关系进行了深度重构，进而引发了“人工智能能否如同人类一般创造价值”这一问题。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核心是：人的活劳动乃商品价值唯一源泉，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确定。人工智能是人类劳动的对象化产物，能借“模仿与强化”提升劳动效率，推动人工智能能力提升，其数据处理和运算能力是对人类劳动技术积淀的体现。本质上，人工智能创造的价值仍归研发与应用它的劳动者。它以算法“自主进化”营造“活劳动”流动假象，实则是人类智能的“技术具象”，并非创造价值的“活劳动”源头。其次，在人工智能时代，价值生产核心转向人的创造性活动。拓展劳动概念内涵，应作为劳动价值论新课题。一方面，人工智能大规模应用下，资本为给自身“攫取生产力”的行径披上“合理”外衣，将人工智能粉饰为“活劳动”，以此模糊社会生产关系的边界，使得在资本体系下人的生存活动被裹挟进价值生产过程。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还通过重塑日常生活，试图“驱逐”活劳动，这引发了从人类价值生产的深刻危机，催生新的流动形态。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可洞察劳动现实化与工人非现实化之矛盾，资本权力化致劳动者自我异化困境，以及物人格化与人格物化现象，自此予以批判性社会逻辑。需主动直面新问题，推动劳动价值实践变革与理论创新，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与新动力。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